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何思慎

擺盪在兩岸之間：
戰後日本對華政策 1945-1997

莊文一/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日本對華政策（以下簡稱對華政策）的實像與特徵為何，特別是戰後時期部分，常眾說紛紜，有專門從內政觀點來討論者；¹或者以為文化因素於此議題具有明顯解釋力；²亦有專就國際層次的角度論中日關係發展者。³本書在理論途徑上，從新現實主義的視角出發，將冷戰結構的變遷作為整個中日關係以及對華政策遞嬗的背景，也從國內環境著手，論及日本國內政治單元互動（特別是自民黨內派系的互動）如何影響對華政策的制定，此外作者認為國內因素除了政治單元的互動之外，首相作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與實行者，其對世局的認知以及價值觀也是對華政策的一個變項，為了涵括上述變項，作者引用系統理論與多元因素途徑，作為研究對華政策的分析架構，將日本制定對華政策的要素分成三大類：內部環境、外部環境、內部與外部的聯繫（頁8）。並鑒於本身背景，作者亦強調文化因素在日本政治決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研究途徑亦被作者選為理解對華政策發展的一個分析途徑。至於研究方法，本書選擇質性研究的文件分析法以及歷史研究法，以政府公報、學者論述、新聞資料為分析素材，採

書名：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 1945-1997

著者：何思慎

出版者：東大圖書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1999年

頁數：253頁

ISBN：957-19-2285-4

¹ 例如趙全勝的《日本政治背後的政治—兼論日本對華政策制定與中日關係》（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² Bradley Richard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4).

³ 山村文人，*タブーへの挑戦：日中關係の過去と将来*（東京：誠美堂，1988）。

直敘方式，在戰後各時期日本所面對的國際政治局勢與外交政策中，依序選擇重點做經驗性分析（頁6）。

如書名所示，本書所分析的時點為1945年到1997年。本書將對華政策的發展粗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冷戰前期(1970年代前)、和解時期(1970年代)、冷戰後期(1980年代)以及後冷戰時期。本書認為日本對華政策雖然有其主觀意願，但自戰後以來一直受到國際結構此客觀因素的制約。因此在1970年代之前，日本雖然試圖與中共交好，但受到冷戰二極對立體系的影響，美國限制日本的外交政策以防止中日友好而使圍堵政策無效，吉田茂只能與美國同中存異，採取政經分離政策，在外交承認上追隨美國承認台灣，但在經濟上則不願放棄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1970年代後美中各有所需而相互靠近，由於擔憂美國之「越頂外交」⁴將出賣日本，日本國內各界紛紛要求政府儘速與中共修好，1972年上台的田中內閣排除國內外中日建交的障礙後，同年與中共發表聯合聲明，對華政策至此翻轉，與中建交直接威脅台日關係存續，但日本仍依循兩個中國以及政經分離原則，並未完全接受中共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同時在與台灣斷交後，仍維持並加強緊密的經貿關係。

時序推演至80年代。此時期國際結構基本上並無多大改變，但日本已

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經濟上的傲人成就使日本人希望政治上亦然，於是從中曾根康弘開始，日本國家發展目標轉向政治大國邁進。日本對華政策即在此背景下有了調整。意識到中國為一股新興勢力，日本為了走出積極自主外交的新方向，需更積極拉攏中國，而中共方面也因改革開放需要大量外資挹注而有意與日建立更緊密關係，因此80年代可說是戰後中日關係最友好的時期。此時的中日互動模式，主要是首腦外交(即中日兩國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接觸)。但中日關係穩定中也有障礙，隨著中共經濟擴張、日本又想邁向政治大國，中日兩國以往的歷史記憶讓雙方對彼此意圖均有不信任感，再加上台灣問題、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釣魚台與中日貿易失衡問題等內在結構摩擦，中日關係看似平靜無波實則暗流潛伏。

後冷戰時期國際結構出現劇烈變化，作者認為蘇聯的潰縮讓體系型態從二極對立轉為一超四強。日本政壇的總保守化加強日本邁向政治大國的力道，而中共被視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且有意主導東亞，於是90年代的中日關係被許多學者視為一種競爭關係，中國威脅論一時在日本甚囂塵上，影響了日本對華政策之制定。但日本亦體認一個經濟脆弱的獨裁中國對日本有害，於是一個中性的對華政策漸漸浮形，日本有意讓中日關係不再從屬於美日關係之下，也就是追求一個日美、日中關係等距的外交政

⁴ 指美國事先未知會日本便自行與中國接觸靠近，而日本全然被蒙在鼓裡。

策。但主觀的想望還是得受客觀環境限制，中日由於內在關係的結構性摩擦存在著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萬一必須在中美之間做出抉擇，作者認為日本當會捨中日友好而就美日同盟（頁198）。台灣問題一直是中日關係的摩擦點，1972年中日國交正常化後，作者認為日本並無對台政策，質言之，作者認為台日關係依附於中日關係之下。雖然後冷戰時期台灣的戰略地位重新被重視，使日本對台政策較以往有彈性，但因受制於日本國內政治勢力進入重整期，外交政策由官僚牽制，是故作者認為台日關係的架構仍然受限於一個中國政策而較難大幅突破。

總結來說，作者認為戰後的對華政策有五個特點，第一，美日同盟。由於歷史因素，戰後至今的日本外交政策一定程度受制於美國，因此對華政策客觀上必須受制於美國亞太戰略佈局。第二，兩個中國。日本自吉田茂以來所奉行的對華政策即是兩個中國，認為台灣與中共並非同一政治實體，其原因，在於台灣是日本生存利益之所在，若中共吞併台灣，對日本將造成直接威脅。第三，聯合國中心主義。日本對華政策，不論是對台灣抑或對中共的承認，均以聯合國見解為主。第四，經濟外交。日本一直想在東亞扮演領導者角色，但由於非戰憲法，軍事已被排除在外交政策工具之外，於是經濟外交成為日本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台日之間，常

將政治聯繫蘊含於經貿關係中，而日本對中共交涉上，對中共之經濟政策亦佔有重要地位，例如政府開發援助(ODA)即為一例。最後則是政經分離。在1972年之前與台灣維持正式外交關係，同時不斷絕與中共之經貿關係。1972年之後台日、中日關係性質倒轉，但仍維持政經二元分離的特色。

綜論全書，此書貢獻在於引介系統理論途徑進入中日關係研究中，為此領域開拓一個新的觀察視角。透過多元因素研究途徑來理解對華政策，吾人可以系統地了解日本對華政策的作用因素主要為國內因素、國際因素、決策者個人特質與對內外環境的認知（即作者書中所指的「外部內部環境的連結」）以及日本政治文化。並從中日互動的歷史，歸納出五個對華政策的特徵，提供吾人日後研究中日關係以及對華政策一個有效的分析指標。

更深入分析本書，我認為這五個特點中，美日同盟與聯合國中心主義屬於國際因素，而政經分離、兩個中國以及經濟外交則為日本國內社會內部機制以及決策者主觀認知兩因素揉合而出現的對華政策原則。但令讀者感到較可惜的是，本書雖然將文化研究也列為研究途徑之一，但全書對於日本人政治文化的描寫比重稍嫌不足，書中特別指明的兩個認為政治文化途徑具有關鍵解釋力的個案—1972年中日國交正常化以及1989年天安門事件，日本的處理特色筆者認為也可

用現實主義國家利益至上以及外交決策理論的非官方外交兩個論點來解釋。

再者，本書作者認為台灣問題為中日關係的一個關鍵障礙，原因在於日本自戰後即採取兩個中國原則，現實地將兩岸認為互不隸屬的兩個政治實體。因此筆者對於本書書名產生好奇：所謂的日本對華政策的「華」，是指中共還是台灣？筆者同意作者認為「日本政府與台北斷交後，似乎在外交政策中缺乏台灣政策」的說法，但仍有一點較為不同的是，筆者認為既然日本對兩岸採取兩個中國及政經分離原則，那麼即使台日關係在80年代因為中日關係達到最友好時期而完全受制於中共的無理要求，最低程度日本應實質上把台灣當成一個自外於中共的政治實體，而且台日之間有著緊密的經貿往來，這些經貿關係便蘊含著政治互動。並且90年代隨著中日衝突激化，日本越來越重視與台灣的互動，台日關係的廣度深度均較前進步，因此後冷戰時期日本究竟是否對台灣有其一套「台灣政策」？因此，藉由本書作者歸納出的日本對華政策五項特點，筆者認為，既然現實上日本已將兩岸視為互不隸屬的兩個政治實體，再加上後冷戰時期中日、台日關係的變化，或許「日本對華政策」在實質上，可以被認為是台日中三角高度連動架構下的「日本對中共政策」以及「日本對台政策」。

王 屏

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

蘇軍璋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正如作者在導言裡提及的，之所以撰寫本書是希望能「在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中釐清近代日本發展的脈絡、找尋其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內在邏輯性」。因此，在「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一書裡，重點探討了日本國內外對亞細亞主義的認識以及從而衍生的應用。本書主要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是「作為『思想』的亞細亞主義」；其次是「作為『行動』的亞細亞主義」；以及「作為『外交戰略』的亞細亞主義」。

作者之所以將本書分為這三大部分，而首先重點討論了「思想」的部分，其原因在於作者認為不論是亞細亞主義逐漸萌發的時代亦或是今日，亞細亞主義都是一個蘊含多重概念且內在或許充滿矛盾的概念，而作者希望能透過其對重要文獻的梳理，使讀者們能更為清晰地掌握此一概念的發展概況，從而獲致一個較為確切的想像。而亞細亞主義對於日本人而言，其實不僅僅是一種「主義」，更為許多思想家、政治人物乃至於軍事家加以活用，「作為『行動』的亞細亞主義」廣泛地被運用在振興日本民族並進而試圖作為擴張領土的指導方針。對於深謀遠慮的日本軍事家來說，亞細亞主義除了是一種對內振興民族主義的工具之外，還是他們用來「佈局亞洲、放眼世界」的一種「外交戰略」。不論是渠等主張的「大陸政策」、「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等，都是一種以「亞細亞主義」作為思考背景的



書名：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
著者：王屏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2004年
頁數：388頁
ISBN：7-100-03989-4

一種外交戰略。

而經過這一連串的演變與運用，究竟一個作為「外交戰略」思考背景下的「亞細亞主義」還是不是原來的「亞細亞主義」？後來的發展有沒有讓原先的概念意涵受影響？作者經由對史料的考察，詳細地探究了亞細亞主義的發展歷程。

在本書中，作者歸納了日本亞細亞主義的發展過程，他認為大致上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78-1898年，這是日本亞細亞主義的形成期，這一個時期以甲午戰爭又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甲午戰爭前，屬於強調亞洲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並主張亞洲各國平等合作的「亞細亞連帶論」，作者稱之為「古典亞細亞主義」。甲午戰爭後，興起的是一種強調由列強共同「保護」中國的「支那保全論」，是一種擴張的、強調與列強共同瓜分中國的企圖。因此，本書的作者認為「甲午戰爭」是近代日本亞細亞主義質變的開始。

1898-1928年是作者所謂的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主要強調的是具體行動，例如參與侵韓行動等。1928-1945年進入了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裡面「亞細亞連帶論」的思想早就被遺棄，取而代之的是不需要任何思想背景的帶有「擴張性」的軍國主義思維。

在本文中，作者將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下了一個清楚的定義：「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是指在西方列強加劇侵略東方的危機時刻，圍繞著

對『東洋』與『西洋』的認識問題而形成的有關日本人亞洲觀的一種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關行動。由於近代日本亞細亞主義複雜而特殊的發展歷程，它又表現為強調亞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亞細亞主義、強調擴張領土的大亞細亞主義以及對亞洲實施侵略的大東亞共圈三種形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在其形成、發展、消亡的過程中，完成了它從『興亞』到『侵亞』的質變歷程。」(頁15)

接著作者討論了兩個同樣論及日本近代亞細亞主義的重要人物，分別是李大釗與孫文，並詳析了二者的主要論述及差別。李大釗主要觀察到的是亞細亞主義中「大亞細亞主義」的面向，也就是強調擴張日本領土的一部分，因此，李大釗認為此一主義是一種「侵略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並進一步提出「新亞細亞主義」旨在聯合亞洲各民族共同對抗日本所提出來的「大亞細亞主義」。孫文所認知到的亞細亞主義，則是本書作者所歸類的「古典亞細亞主義」，因此孫文主張與日本共同復興亞洲民族。

亞細亞主義其實從一開始就帶有其雙重特性，「一方面，它是亞洲民族反抗西方列強的一種思想與行動。另一方面，它也被用來當作日本向亞洲擴張的藉口與手段」。其中，大亞細亞主義是一種橫向不平等的國際關係，是由日本向亞洲各國進行縱向統治的聯合體，並保證日本最大限度的利

益，這種思維在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之後佔有主導性的地位，因此，使得「亞細亞主義」的討論成為敏感的話題。而在本書中，作者希望藉由對近代日本亞細亞主義的重新檢視，讓中國與日本兩國在認識上找到一個新的定位，從而重新思考彼此的經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等問題，走出誤區，為亞洲乃至於世界的和平發展作出貢獻。

雖然作者沒有多加著墨，不過仍可感受到作者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看待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發展的態度是抱持著負面評價的。其實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即便是為極右派所濫用，在其概念上最多也只是強調「以日本為首建構一個縱向的、不平等的亞洲秩序」，也就是說日本是想建構一個近似於中國的華夷秩序，並且取代傳統中國的地位。由此觀之，近代日本想要作的其實不就正是中國幾千年來不斷進行的事？一樣是在建構一個以該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體系罷了。

假如跳脫一個作為中國人的立場來思考，我們該從哪個角度去批判近代日本的行為？我們該用哪些論述來證成日本狼子野心的論述？既然雙方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為什麼中國做就應該被寄予一種理所當然的認可，而日本的行為卻是千夫所指？中國在面對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時，佔據的批判性的位置究竟是由於中國是近代日本對華政策下的實質受害者？抑或是對傳統中國所建構出來的華夷秩序

可能遭到破壞與威脅所產生出來的焦慮？

簡單的來說，近代中國將日本視為一個「侵略者」，究竟是由於日本「實際上」對中國的侵略，還是日本正嚴重地威脅中國人的「認識」？

當然，或許正如日本學者川島真在去年一場由台大政治系邀請的講座：「中日歷史問題的『歷史性』：以教科書為例」中所指出的，中國之所以將日本視為最大的侵略者，可能是因為1900年代，正值中國國家認同逐漸形成之際，日本為壟斷東北利益而強佔中國領土，因此被視為中國國族最大的挑戰者。川島教授也認為，之所以日本至今被中國民族主義者當成頭號敵人的原因除了八年抗戰的慘烈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日本的侵略中國恰好在中國國族認同形成之初，理所當然被當成中國國族的最大敵國。

把這個時間點（1900年）拿來對照日本亞細亞主義的發展階段，恰巧可以發現當中國的國家認同逐漸成形的同時，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正好逐漸擺脫古典亞細亞主義的溫和、平等、共榮、發展的道路，走向強調以日本為領導核心的新亞洲秩序，似乎不難體會為何中日兩國常常處於緊張關係。

最後，在本書中，作者提到最近日本在亞細亞主義的發展上有逐漸向古典亞細亞主義靠攏的趨勢，因此作者對回歸亞洲共同和平發展的景況，持樂觀積極的態度。然而，究竟日本

在亞細亞主義各個階段是一種全面的思想交替？還是不完全的演進？是否各個發展階段都殘有上個階段思想？顯然，在作者的若干討論中不難發現，亞細亞主義的論辯是交錯複雜而且多元的，每個階段有非主流思想的人的存在是必然的，那麼，作者是用什麼樣的立場來談最近的日本在亞細亞主義上的思想漸趨溫和？我們該如何相信現在這些談論亞細亞主義的日本論者是致力於共同且平等地發展亞洲，而不是仍然以榮耀日本國為己任？我們該如何相信日本近來的作為對中國乃至於周邊國家是全然的友善？這似乎仍是一大問題。

小森陽一

天皇的玉音放送

陳建廷 /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1945年8月15日，對當時身在日本的人而言，是個重大的一天，就在中午時分，家家戶戶都守在收音機旁邊，因為日本偉大的昭和天皇裕仁宣佈重大的訊息，就是發表《終戰詔書》，宣告日本放棄戰爭。而這段經過就被稱之為「玉音放送」。因此，日本每逢8月15日，各大媒體都會再度撥放這段「玉音放送」，以紀念過去日本這段歷史並有警惕日本人的意味。

但在此事件滿50年的前兩年，小森陽一教授出版了《天皇的玉音放送》，帶著讀者們來重新解讀這段歷史和相關文件。小森陽一是日本東京大學的文學教授，因此本書主要是從文學的角度去重新解讀文字，而非是要從歷史中發掘出新證據，雖然後來有大陸學者指出文中有些關於歷史事實的陳述是錯誤的¹，譬如說人名或職稱方面的錯誤，但或許是翻譯的問題或是本來作者就是如此寫，這點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作者到譯者都是文學家的面向看來，本書的重點應該是在重新解讀文字方面上，而歷史專有名詞的陳述到底是否符合史實就不是如此重要了，畢竟歷史結構上是沒有問題的，只是當作者在處理相關人名或職稱時的錯誤罷了。

作者主要希望藉由本書來告訴讀者，當時昭和天皇是如何透過文字來免除自己的責任，以及戰敗後聯軍司令官麥克阿瑟與後來的聯合國占領軍司令



書名：天皇的玉音放送
著者：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
出版者：三聯書店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2004年
頁數：312頁
ISBN：7-108-02146-3

¹ 相關的內容請參考黃力民，《天皇的玉音放送》之錯訛及其他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443>
世紀中國網站，2005.4.15

部 (General Headquarters, 簡稱 GHQ) 如何與日本官員一起免除天皇的戰爭責任, 使裕仁得以不必接受東京審判並且仍然保有天皇的地位。本書共有七章, 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部份來看。

首先在第一部份, 主要是重新解讀《終戰詔書》上。作者藉由重新閱讀與此事件相關的紀錄中, 明確地指出在原子彈爆炸之後, 當時日本的官員已經知道戰爭終將失敗, 因此官員必須努力地透過各種方式來保持天皇的神聖地位, 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所述:「大日本帝國乃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 同時在第三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及第四條:「天皇乃國家元首, 總攬統治權」, 可以說天皇就是日本國體的代表, 加上天皇血統的神聖性, 所以天皇地位一旦動搖, 代表著日本這個國家有了危機。因此官員們有計劃地將天皇裕仁的責任免除。透過許多當時留下的資料與會議資料顯示, 當時日本官員的當務之急並不是處理遭受攻擊下死傷的人民, 而是忙著維護天皇的神聖地位, 以及「近代天皇制」² 架構的完整。在最後確立與宣布的《終戰詔書》一文中, 看不到天皇有任何道歉, 也沒有看到天皇要有所負責的意涵, 一切戰爭責任都推給底下的文武官員, 而且以「終

戰」來取代「戰敗」, 是因為天皇的仁慈胸懷不願看見人民繼續受苦, 因此忍痛宣告終止戰爭。在當時的會議中, 日本一直不願意承認戰爭失敗, 只是認為戰況一直沒有好轉, 為了讓天皇可以順利地脫離責任, 因此必須忍痛做出這個決定。在當時的日本官員心中, 人民戰後的民生問題都不比維持國體的重要, 可見過去天皇制對日本的重重大影響。

再來於第二部份, 主要告訴我們戰爭結束後, 麥克阿瑟與聯合國佔領軍司令部 (General Headquarters, 簡稱 GHQ) 是透過什麼方法與日本官員共同免去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 並且繼續保有天皇制。透過作者將相關的歷史文件重新解讀, 當時的麥克阿瑟本想將昭和天皇以戰犯處理, 但透過天皇親信不斷地居間溝通之下, 麥克阿瑟為了更有效地控制日本, 最後妥協做出讓步。在這種互相利用的情況下, 裕仁天皇順利地免除發動戰爭的責任, 麥克阿瑟也順利地接管日本。到了 GHQ 時期, 因為韓戰的爆發, 急需要日本的資源, 所以他們也希望可以為天皇脫罪, 使天皇可以不必接受東京審判, 因為他們理解天皇在當時日本人民心中的地位, 一旦天皇有事, 日本國內局勢必定動盪不安, 也不利於韓戰的發展。為了可以順利推行戰後政策以及改造計劃, 使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對抗共產黨的基地與民主堡壘, GHQ 當局與日本官員開始精心規劃一套劇本, 使天皇不但完全免

²這個概念是1920年代後半期由當時的馬克思學者提出的, 意指天皇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統治權以及命令文武官員執行命令的權利, 並且受到日本憲法確立保護的制度。而近代天皇制正是日本從幕府末年為了克服本國面臨直接的危險, 所一點一滴的建構起來的一套制度。(頁5-6)

責，還可繼續保有天皇的地位。因此一個嶄新的天皇制就此誕生，也就是現在日本的「天皇象徵制」。在雙方協議之下，GHQ當局透過許多法令的頒布將天皇的實權漸漸過渡到內閣首相身上，使這個過去天皇擁有實權的君主立憲制可以轉變為天皇純為象徵的君主立憲/內閣民主制。天皇只有代表日本國體的象徵意義，本身已經沒有實權。這樣一來天皇過去為神的地位也因此消失，天皇就變成跟一般人一樣，因此也順利將過去政教合一的制度改變為政教分離。雖然天皇裕仁可以免去一切戰爭責任，但地位已經大不如往昔，過去的風光已經不在。

最後一個部份，作者把場景拉回到現今的日本來看，作者認為現在日本社會有著明顯的右傾化現象，是值得警惕的。主要透過兩個事件說明，一是小泉內閣多次正式參拜靖國神社與派遣自衛隊前往伊拉克，另一個則是歷史教科書修改事件。前者反映了已經消失的近代天皇制正在悄悄的重新建構，因為過去軍隊統帥權與官方祭祀權正是天皇專屬的權利，而今日小泉內閣似乎正在行使這些權利，使作者認為過去那種近代天皇制的精神正在重新地被架構。後者則是右翼份子希望透過美化過去二手歷史的部份，再次為天皇脫罪也希望擺脫戰後日本國民心中的自虐史觀。最後作者提醒了我們一點，今日的美國也好像有過去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傾向出現。在 911 事件後，美國的小布希政權激

勵人民的愛國精神並對外進行大規模戰爭，不就是在建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嗎？而今日的日本，走出了戰後的貧乏，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隨著與美國間的相互利用，日本也開始想要轉變為政治大國，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作者認為這是值得審慎考量的，因為日本一旦開始轉變，必定會引發周圍亞洲國家的緊張。例如在 2003 年小泉內閣期間通過了特殊法案派遣自衛隊前往伊拉克，這個事件引起了亞洲國家的緊張，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再次復甦，所以日本要邁向政治大國的過程難免充滿爭議，因此轉變的過程需要審慎考量。

透過閱讀此書，除了可以了解到在那段戰爭末期到戰爭結束時，日本官方的種種行為，更透過作者小森陽一的帶領，讓我們發掘過去我們所忽略或未經確認的事實。到底昭和天皇最後有沒有負責，在日本社會現在依然有人認為在戰後的天皇裕仁已經在〈一億總懺悔〉宣言表示歉意與全面負責，但也許這些人在看完此書後或許會有不同的觀點。其實這種重新解讀文本的動作，在最近幾年來也越來越風行，許多過去歷史的文件與紀錄被拿出來重新檢視，譬如說近年來流行的一部小說《達文西密碼》也是在做類似的工作。雖然本書是將過去的歷史文件再解讀，而《達文西密碼》則是在重新解讀宗教中的傳奇性文件，兩者分析的文本性質不同，但他們都以重新解讀的方式來呈現作者想

表達的意念，而且兩書都無法提供有利的證據來加以佐證。因此個人認為，重新解讀並重新挖掘的這種行為，帶有非常強的主觀性，所以往往都會伴隨著很大的爭議性。

關於本書的主要論點，個人認為有兩點可以值得探討。首先，關於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作者透過此書告訴我們天皇是如何用盡各種手段來使自己免於負責，但事實到底是天皇刻意的安排，還是完全是日本官員的精心傑作，我們不得而知。小森陽一的這種解讀，有人認為他是在東京審判後對昭和天皇進行了徹底的文字審判，因為他徹底地揭露了天皇為了維護「國體」而犧牲了日本人民權益的事實，明確地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也揭穿了東京審判前後美國與天皇裕仁為了各自利益所進行的話語行為中「真實/謊言」的結構。(頁 295-296)但這種文字上的再解讀，只能說把我們過去忽略的事實重新呈現，但對於歷史的再澄清卻很難起作用，因為文中沒有提出新的證據來加以說明。就如《達文西密碼》一樣，提供了讀者一個可能性，但或許這是作者留下的伏筆，至於歷史的線索就留給讀者去尋找跟摸索。

再來是有關於書中提到近代天皇制復甦的論點，這點是非常有趣的。如作者所言，現在的日本社會的確有著明顯的右傾化現象，加上小泉內閣近年來的行為，透過作者的觀察，近

代天皇制的特徵出現在小泉內閣的身上，這對日本或許是個警訊，這使我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察力。更有趣的是作者將這種現象也拿來說明美國，小布希政權在911後的種種行為，在作者眼中彷彿就看見了在幕府末年受到外力衝擊的日本一樣，作者認為美國正透過反恐怖主義的名目，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不就是又再度看到近代天皇制的特徵？作者提出這種觀察，個人認為除了警惕日本不要走回頭路外，更是警告日本應該要跟美國保持距離，日本應該要重新建立跟亞洲國家的關係，回歸到亞洲來才是對日本未來最好的選擇。

透過小森陽一對過去的調查與未來的展望，不得不佩服他驚人的觀察力，也將過去被日本忽略的事實重見天日，讓我們看到與過去不一樣的一段歷史。或許透過小森陽一的方法，運用於解讀政治人物的話語行為時，應該更能夠看清事實，或許可以找到弦外之音。

長篇書評

敲開金磚：從四本書談中國經濟運作的地方基礎與外部性問題

吳文欽 /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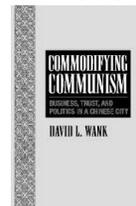
前言：

中國大陸自 1979 年改革開放後的二十餘年以來，以平均每年 9% 的經濟成長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特別是在 2001 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中國挾其本身充沛而低廉的勞力優勢，一方面強化其「世界工廠」的地位，一方面又加速吸引外資投入，為經濟發展投入更多動力，以致於在 2003 年初，美國高盛證券提出一份研究報告，預測 2050 年左右，中國和巴西、印度、以及俄羅斯等四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將會超前或趨近於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的水準，成為金磚四國（BRICs，與 bricks 同音）。之後，這份報告隨著台灣《商業週刊》在 2005 年二月底的封面故事和往後的一系列專題的報導之下，讓「金磚四國」瞬間成為中文世界熟知的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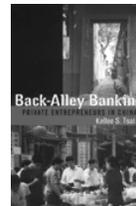
姑且不論「高盛報告」的預測是否準確，中國的經濟表現和發展潛力已經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以 2005 年為例，它已經是世界全球第五大經濟體，並創造一千餘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使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增無減，進一步成為近兩年來中國和美國外交關係的主要摩擦之一。不過，一般在討論中國這片看似美好的總體經濟榮景的同時，一方面極易忽略了如此的經濟成長，實際上也是透過相當複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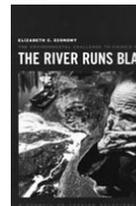
書名：Rural China Takes Off :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著者：Jean C. Oi
出版者：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地：California
出版日期：2001
頁數：253 pages
ISBN：0-520-20006-3



書名：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著者：David L. Wank
出版者：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1999
頁數：298 pages
ISBN：0-521-62973-2



書名：Back-Alley Banking :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著者：Kelles S. Tsai
出版者：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2002
頁數：316 pages
ISBN：0-8014-3928-0



書名：The River Runs Black :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著者：Elizabeth Economy
出版者：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
出版日期：337 pages
頁數：337 pages
ISBN：0-8014-4220-6

地方基礎所運作和支撐，另一方面，也往往未提及高度經濟成長率，其實也附帶了相當大的環境污染等外部成本，於是，我們便需要微觀的視野去瞭解中央政策在執行的同時，有哪些為人所忽略、但實際上是也是造就、或者是阻礙經濟成長的在地面向，這也是本文欲選取以下四本書進行評介的原因。

地方統合主義

首先，關於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長，有些學者認為可以放在早期東亞幾個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 Countries, NICs）的脈絡下來看，亦即國家透過產業政策去干預市場機制，有計畫地尋求經濟成長所致。然而，Jean Oi 卻指出，這個分析架構忽略了中國內部長期存在的中央—地方關係，實際上也在經濟發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認為，中國地方政府（縣、鄉、村，但不包括省）支撐了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長，她把這種以地方政府為核心的經濟型態，稱為「地方統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

為了論證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功能，Oi 認為從中央—地方財政收支劃分出發，引入賽局理論中的「委託—代理人」（Principle-Agent）模式，說明中央（principle）施政必須倚靠地方（agent）的稅收，但是「如何向地方收稅」變成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收太多，地方沒有生產誘因，收太少，中央免不了面臨財政困窘，

甚至是國家統治能力降低，進而威脅政權穩定，這也是中國在上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數次實行財政改革的原因。只是，當中央透過財政改革對地方「放權讓利」之後，固然讓地方政府有誘因去發展集體產權或其他具有私營型態的企業（collective ownership enterprises），並藉此將稅收上繳中央，但同時也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地方政府如何有效控制這些因為經濟改革而竄起的菁英，而不致於陷入另一次的「委託—代理」危機？

於是，Oi 認為，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儘管其經濟表現相當沒效率，但卻建立了基層統治的基礎，這使得改革開放之後，地方政府在對待它的企業時，呈現了兩面性格：一方面必須要對其收稅（掠奪），另一方面又要支持其繼續發展，以維續自身的統治運作，而這種地方政府和企業互動的型態，便是她所謂的「地方統合主義」。亦即以「縣」為首，其下又統轄「鄉（鎮）」、「村」，這三個單位各自有極大化自己利益的動機、有自己關係網絡、籌碼和動員組織，也分別負有來自上級的績效壓力，想辦法開發財源。但是，它們的運作型態並非互相對立衝突：首先，縣級地方政府靠著握有較多資源的優勢，對鄉（鎮）、村單位進行控管。然而，下級單位如果在執行上有困難，亦可以請求上級援助，要是上級領導者若是無法解決，亦可以尋求其他縣的協助，也就是說，制度本身提供了行為者追求利益

的門路。

大致上，「地方統合主義」有以下特徵：(1) 指導型計畫：由地方政府提供企業生產誘因，(2) 差別待遇：地方政府根據和企業的關係和契約，提供不同的優惠，(3) 培育重點產業：利用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予以重點企業融資和其他優惠，(4) 提供其他發展所需資源、資訊與科技。當然，除了胡蘿蔔之外，地方政府也有自己「棍棒」策略，讓這些私營企業不得不跟它配合，例如透過執照的發放與管制，或是成立「個體協會」，對企業進行管制、監控。

一言以蔽之，Oi 認為是制度所提供的激勵機制，讓地方政府跟企業都有誘因尋求經濟成長，最後發展出具有鑲嵌、合作性質的「地方統合主義」，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不過，也就是因為假定了地方政府都是致力追求經濟成長、且和企業家的利益是一致而令雙方有合作空間，讓這個理論有它的不足之處。首先，如果地方政府和企業都有自利動機的話，那麼各自尋租 (rent-seeking) 的結果也有可能是前者掠奪了後者的利潤，而非總是 Oi 所認為的互相合作，其次，在排除了中央和省的介入空間之後，Oi 未交代為何以縣為首的地方政府，能夠完全有效統合下級單位跟企業活動？「地方統合主義」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地方政府常常捲入企業的經營運作裡。然而，當規模和能力大到一定程度時，或者

是私營企業開始成長時，它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利益依舊沒有衝突嗎？也就是說，如果結構性誘因讓行為者去追求經濟成長，那麼關於不同行為者之間如何在結構中行動，並未本書中有太多的著墨，有待以下兩本書的補充。

恩庇侍從關係

不同於 Oi 聚焦於制度所造成的激勵效果，David Wank 則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運用在廈門的田野調查資料，探討了中國大陸公、私部門之間的互動如何促成經濟成長。他發現過去共產黨統治下的「恩庇侍從」(Principle-Client) 關係，在改革開放後呈現新的結盟型態，其中又以官僚將手邊權力跟資源進行「商品化」(Commodifying) 為代表：亦即他們透過本身的地位或關係網路，將公有資源商品化，並從中牟取利益。而且不同於 Oi 的是，Wank 並未將地方政府和企業二分化，反而強調兩者之間其實有很多模糊地帶，而且經濟改革也不全然是為了替公部門創造利潤，反而是有很多中飽私囊、貪污腐化的情形。

Wank 分析了官僚跟企業家之間的「恩庇侍從關係」如何在市場中發揮作用。他一方面從訪談中所得到的俚語 (idiom) — 諸如面子、人情、靠山——分析出「關係」是官僚跟企業互動的基礎。其次，他將企業家創業前的背景分為投機客、工人、官員三種，發現他們彼此不同的背景，決定

了他們從商之後的人脈發展與其和公部門的關係，例如對背景是公務員的企業家來說，因為職業、家世、教育等因素，累積了較多社會資本，與公家的關係相當密切，並藉此創造、轉換成經濟資本，相反的，其他兩類型的人則沒有豐厚的社會資本，只能尋求其他方式生存，例如投機者是從黑市中累積社會資本。此外，Wank 也指出，社會資本並非給定的常數，可透過和官方套關係，捐款、送禮等方式來提升。

Wank 進一步指出，在企業家和官僚進行結盟的同時，也令原本的侍從關係發生變化，例如企業本身的資源、以及在不同恩主之間的選擇，都隱藏了結盟所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於是在中央—地方關係方面，Wank 用動態的觀點，提出不同於 Oi 的看法。他認為，儘管地方政府有逃避中央監督的動機，但中央政府其實也可以用軟硬兼施的方法去令其順從；從地方角度來看，中央仍然握有對於採取改革發動權，讓地方政府必須小心處理和轄下企業的關係，是故地方政府也依賴和中央的互動以便收到較多訊息。也就是說，中央和地方政府也處於某種形式上的恩庇侍從關係的網絡之中，而這個網絡是在「地方統合主義」架構中所無法呈現、卻是影響經濟行為的重要變數。

另外，Wank 也比較中國與東歐在經濟改革上的不同路徑。就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它與企業具有

較多的互動，故比較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另外，中國當局進行經濟改革的成本較小，而且改革過程並未撕裂官僚和民間的既存的關係；反觀東歐在變天之後，經歷了公權力空窗期，經濟發展遂徒增許多交易成本（例如黑道介入）。於是，Wank 認為中國和東歐的制度安排的不同，是造成發展相異的原因：中國的制度一方面承載了較強的權威，另一方面也因為「關係」的存在而展現了相當靈活的彈性，讓它不斷擴張，同時也迫使成員必須履行對於組織的義務，造成了地方上的企業跟政府關係緊密的現象。

Wank 在本書中呈現了隱藏於制度設計之下的「關係」，如何決定官僚與企業的互動，並模糊了國家和市場的界線。Wank 的研究其實挑戰了 Oi 在發展「地方統合主義」的假設：制度安排提供了不同的尋租管道，同時也極大化了總體利益，但 Wank 卻提出說明「關係」才是令制度活絡的因素，甚至，當行為者利用關係去尋租的過程中，不必然會造成總體利益的極大化，反而是侵佔了公部門的資源。然而，美中不足的是，Wank 並未能進一步區分「關係」的等級和類別。也就是說，不同層級的「關係」會對企業經營有相異的影響，甚至「關係」彼此會有潛在衝突，而不能一概視之。此外，當官僚跟企業兩者進行權力跟資源轉換的同時所引發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問題，亦是 Wank 所未深入著墨的部分。最後，相較於 Oi 認為中央政

府是刻意在地方經濟上的放權讓利，讓地方政府有自主空間，Wank 未處理的問題是，中央政府在面對這種地方上的權錢交換時，究竟是力有未逮、刻意放縱，抑或是本身也其實捲入「商品化」的過程？

企業家的集資管道

Oi 和 Wank 分別提出「制度」、「關係」對於中國經濟活動的影響，而 Kelles S. Tsai 則從個體的角度出發，去探討當中國在基層金融體制尚未健全、國有銀行對於貸款給私人企業心有排拒之際，企業家如何透過本身的政治和社會資源，利用許多非正式管道募集資金。這個主題的重要性在於，因為西方的古典經濟學遲遲無法有效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中國文化中對於產權觀念的模糊，造成許多非正式金融的長期存在，所以如果分析非正式金融管道在經濟體系的功能，也可以反映中國經濟成長的潛在因素。同時，Tsai 這本書也可以補充另一個在 Wank 並未著墨的面向：如果無法拉到與公部門之間關係，企業家要如何自行集資發展？

詳盡地蒐羅了不同的非正式集資管道的運作方式，以拼湊出企業家在面臨國家實施金融控制時的應變能力，是本書最大的價值。Tsai 運用大量田野資料分析了非正式金融活動——尤其是互助會——在中國不同地區的狀況，她發現這些非正式金融活動的運作情形，會隨著地區的不同而有差異，這主要是由於改革開放後的初始

條件不同、企業家本身的條件、以及中央對於地方的金融控制能力有所不同所致。例如在溫州，地方政府對於私營企業的態度較為寬容，因此發展出較多型態的非正式金融管道。

如果我們延續 Wank 的看法，「關係」是活絡經濟交易的主要因素，那麼 Tsai 對於各種互助會的描述，更是進一步確認這樣的論點——而這又是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的部分：互助會是以各種「關係」所織成的集資網絡，跟西方國家以「信用」或「擔保品」為基礎的借貸條件，有著明顯差異。其中，或許是同為女性的緣故，Tsai 花了不少篇幅指出女性在互助會中的關鍵角色。她認為是因為向銀行的告貸的網絡排拒了女性參與，但女性間的社群意識又讓她們可以私下集資，所以造成女性在「近用」(access) 互助會的機率比男性高很多的這個事實。

另一方面，Tsai 指出，地方政府對於非正式金融管道的態度儘管寬容，但也不是全然放縱，它至少有三個干預私人金融的時機：無法從私人金融活動中牟利、私人金融活動太過招搖、或者是干預後會帶來政治利益。因此，Tsai 呼應了 Oi 和 Wank 的研究：政府和企業家的關係並非永遠處於緊張對立的狀況，而是雙方各自尋租、互動。於是，她進一步將企業與地方的互動關係，透過前者對後者的依賴程度和本身機動性的高低，劃分成四種模式(pp.131-33)，其中又主要分成紅

帽和諧模式 (red hat harmony, 雙方互動良好, 利益是互相議價而來) 與敲詐和諧模式 (extorted harmony, 政府對企業有優勢影響力, 尤其當它認為企業行為會影響經濟穩定或觸犯上級所重視的法律時, 便會出面管制)。可見政府對於私人金融的態度, 主要還是取決於它會不會影響到正常的經濟運作。以「標會」為例, 起初主要是用來購買消費品或應急之用, 之後逐漸發展出可以從中獲取暴利的功能——包括像「以會養會」、或是如「老鼠會」般吸引了大批民眾競相投入——使得一旦這種投機的資金管道發生問題, 其後果將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 也讓政府後來在善後了一些倒會風波後, 下令禁止一切形式的組會。

與此同時, 卻還有一些非正式金融管道並處於遊走於模糊地帶, 它們可能是根據政府的某項政策或文件而成立 (例如私人錢莊), 不但不受到監督, 績效又比正式金融管道來得好, 但後來由於如此放縱也會出問題, 1997 年之後便逐漸轉型成商業銀行, 接受監督, 是故我們也可以看到政府如何控管這些非正式金融: 當可以導正時, 政府會鼓勵其「化暗為明」, 以便監督, 當不能有效控制時, 則採用公權力介入, 限制其業務或乾脆勒令停業。而且各級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值得玩味: 當保有非正式金融管道對其有利且無大害時, 它便會向上級政府爭取保留它, 而非通通不准, 這也是促成許多非正式金融管道「制度化」

的原因。然而, 這樣的分析留下一個盲點: 當非正式金融是因為政府提供的正式金融管道難以進入而產生的應變項時, 前者有時候又在後者默許下存在, 並隨時會被干預, 那麼在這種自變項模糊的情況下, 便很難確認政之於非正式金融活動中的角色了。

經濟發展的外部性

以上三本書皆把焦點集中在不同的地方行為者如何因為自利動機, 最後促成中國的經濟成長, 可是這些作者依舊忽略了另一個面向, 就是這樣的經濟成就, 很大一部份是大量且密集的人力與自然資源的投入所致, 而且, 由於「摸著石頭過河」的發展邏輯, 使得追求經濟發展時, 沒有一套長遠的「大戰略」, 使得個體行為者的經濟理性, 最後帶來嚴重的負外部性問題, 其中又以環境污染與無法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為代表。Elizabeth Economy 便從「環境政治」的面向出發, 把原本從地方經濟活動退場的中央政府, 重新拉進來討論, 同時呈現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背後, 付出哪些環保代價、又該如何突破「公共財危機」的困境。

Economy 檢視了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觀, 發現儘管先聖諸賢教導人們要與自然環境和平共處, 但是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中, 環保工作的落實與否, 往往要靠主政者的態度, 這是中國進行環保的先天缺陷之一。環保工作難以推行的另一個缺陷則是毛時期的諸項運動, 不但造成資源浪費, 更

對環境造成難以彌補的破壞，加上後來暴增的人口，對環境帶來相當沈重的負擔。於是長期以來因為經濟成長而形成嚴重公共污染，對十三億人口構成巨大威脅，使得政府不得不開始面對、處理環保議題。

諷刺的是，當中國政府要處理環保問題時，卻又面臨幾道難題：若真要落實環保，首當其衝的便是那些對經濟成長有貢獻的企業（尤其是鄉鎮企業），一旦嚴格執法，便可能造成利潤降低或是大量失業。其次，中國本來就沒有什麼「明文制定」的環保法規，環保大部分都是靠人治，使得地方官員沒有多大誘因，破壞和當地企業的共生關係，執行中央所交辦的環保稽查任務，結果往往是到了東窗事發，地方出現抗爭，才開始進行補救措施。

由於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外部性問題，既全面（跨行政區）又深遠（人人受害），若是地方官僚沒有處理好環保抗爭，事情一旦鬧大，會威脅統治的正當性，中央必須要花更大成本去善後。因此，中國目前採取兩種方式處理此問題，一是將環保事權下放到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肩負部分國家權威，結合其組織者的關係網絡與媒體影響力，監督、落實環保工作，二是透過國際接軌，引用先進國家的技術與經驗，進行技術轉型，以免繼續造成更大的污染。

然而，Economy 認為中央的「事

權下放」是在「走鋼索」(tightrope)，因為一旦授權這些和既得利益者較無掛勾的 NGO，從事環境污染的整頓與永續發展的任務，隨著他們的勃興，會漸漸讓共產黨失去對市民社會的控制，甚至可能發生這些團體進行串連結盟，對挑戰（無能的）中央政權的狀況（例如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導致像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由民間團體推翻共產政權的現象，這是當前領導者不願重蹈的覆轍。而在國際接軌這一方面，Economy 指出，各國（尤其是易受中國環境污染之害如沙塵暴的日本）相當願意幫助中國落實環保工作，只是，中國一方面樂見引入外國資金與技術，進行國家發展，一方面也不願意讓某些較嚴格的國際標準，阻礙的本身的經濟發展，更擔心那些假「協助技術轉型」而入侵的外國勢力，會更進一步剝削中國的勞力與資源。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環保問題所隱含的「政治性」：原本是攸關公共利益的問題，最後還是淪為政治鬥爭的場域。Economy 以中國興建三峽大壩與進行西部大開發為例，指出大壩工程所造成的生態破壞、以及興建完成之後的成效，一直是世界各國抨擊與質疑的焦點，但卻被中國當局給刻意淡化處理；次就「西部大開發」而言，其「發展西部、支援東部」的經濟邏輯亦有點本末倒置，一是西部的自然資源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充沛，二是會重蹈污染東部的覆轍，所以她認為，

西部大開發的決策並不純粹是從經濟角度出發，而是有「政治控制」的考量：避免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持續坐大。

至於中國要如何永續發展？作者在第八章特別援引後東歐等前蘇聯國家的經驗，認為第一步要先加強政府的認知（awareness），願意支持、落實環保政策，其次是要有「環境行動主義」（environmental activism），引進基層社會的力量來參與環保任務，最後是將這種動能轉移到其他改革議題，例如對抗官僚貪腐或是催生基層民主，不過，作者也指出，假使 NGO 要形成關鍵的政治改革力量，必須有下列三項條件：（1）能夠整合既有的政治異議，（2）能和其他的 NGO 串連，（3）特定時機出現的觸媒因素。而按照目前中國持續以發展經濟為第一要務的情況來看，環保 NGO 所能扮演的角色似乎仍然有限。

本書的最大價值在於指陳了中國環保問題的嚴重性之外，也點出了處理環保問題時會所會遭遇的矛盾：地方上的理性尋租，最後造成環境污染的公共財危機，但當中央政府在處理危機時，卻是投鼠忌器，不希望阻礙經濟成長或是政治利益受損。如果我們進一步把本書的環保主題，拉進前三本書的討論脈絡下來看時，我們更能肯定中國政府其實在解決環保問題上有其難為之處，因為在「地方統合

主義」的架構下，它本身也是環境污染的共犯之一，加上它和地方經濟的共生關係，更令它無法有效進行危機防範，這也是為何環保問題往往都是等到東窗事發，才來尋補救方法的緣故。

結語：

本文檢視了四本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著作，探討中國在追求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無論中央、地方政府，還有企業家，如何在現存的制度中，採取各自的尋租行為。這些著作呈現了中國目前變動中的「國家—社會」關係。一方面，中央政府逐漸鬆綁對於地方政府和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讓後兩者有共同合作以追求利潤的誘因；但另一方面，地方成員彼此間的關係，也使他们們的互動有時候處於衝突狀態，這時候企業家便只能利用個人的政治或社會資源以集資創業。然而，儘管中央政府依舊可以透過制度安排力來影響地方上的經濟運作，但當它在處理這種經濟競爭所產生的負外部性問題時，卻因為其他政治考量而顯得力不從心，這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難題，也是「金磚」光芒所照射不到的盲區。

長篇書評

驕傲與權杖：評杜斯妥耶夫斯基《罪與罰》、
《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卡謬《異鄉人》

林曉欽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Remember therefore from *whence thou art fallen*, and repent, and do the first works; or else I will come unto thee quickly, and will remove thy candlestick out of his place, except thou repent.

-- Revelation

And they shall look unto the earth; and *behold trouble and darkness, dimness of anguish; and they shall be driven to darkness.*

-- Isaiah

The central Issue for political theory is no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elf but *the connection of constituted selves, the pattern of social relations.*

--Michael Walzer¹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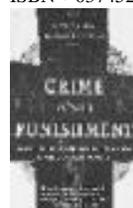
杜斯妥也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1821-1881), 曾被判處死刑而逃過一劫, 流放過西伯利亞; 在近乎十年的歲月中, 染上賭癮; 紀德稱他是我們最偉大的文學家, 而尼采將他視為精神導師。同時, 卡夫卡與菲莉絲的書信中也提到自己深受與他有血緣關係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影響。²

¹ Michael Walzer, *Politics and Passion*, Bost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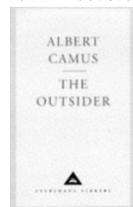
²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與第二任妻子, 協助其完成多本小說的安



書名：The Brothers Karamazov
著者：Fyodor Dostoevsky
出版者：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2002
頁數：824 pages
ISBN：0374528373



書名：Crime and Punishment
著者：Fyodor Dostoevsky
出版者：Vintage Books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1992
頁數：592 pages
ISBN：0678734503



書名：The Outsider
著者：Albert Camus
出版者：Everyman's Library Ltd
出版地：
出版日期：1998
頁數：
ISBN：1857151399

一八四三年，杜斯妥也夫斯基為中尉軍人，離開軍隊後，一八四五年完成第一本小說：窮人。一八四九年，參與烏托邦社會主義團體判死刑後獲得特赦，轉流放西伯利亞。在這數年間杜斯妥也夫斯基接觸聖經，這也解釋了何以在《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中，上帝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是典型俄羅斯式文學，在情節中也盡是獨特的俄羅斯思維向度：對貧窮、農奴，社會底層者之生活苦楚細緻的描繪。他的作品圍繞之主題是一普遍的問題：善與惡，愛與恨，良心與慾望，命運與救贖。他的書寫慣於以細緻精準的描繪人性與劇中人的舉動，以此將人類深處的矛盾，幽暗，衝突刻化於書本中。³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處於動盪的狀態，1812年拿破侖遭到俄羅斯擊敗，陸上帝國的威望持續到十九世紀中葉。亞歷山大一世專注於國際事務，內政由保守派把持，也因此既使社會中的知識份子認為制度有改革的必須，如農業與農奴制度。但保守官僚拒絕，同時農奴也不願意承擔此移轉制度之風險。但，進行戰爭的巨大風險，經濟上的落後，以及對貴族無法有效徵稅，都造成俄國政府的貧弱。農奴問題，經濟問題，社會的停滯造成整體時代氛圍，不是提倡基進的社會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否則就是由貴族或者自由派希望能夠建立起代議等類民主的政體。在這樣的時代中，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這樣一個敏銳的，幾近於邊緣的，看盡社會下層生活百狀的一個知識份子，所書寫的作品，自然關懷的是在此時代中，身處於社會中下層只得隨時代決定的個

³ 宋雲森，1998，更高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杜斯妥也夫斯基，聯合文學 15:2：45-49。

人，如何保衛自己，甚至打破桎梏，超越自己？根據佛洛依德的分析，杜斯妥也夫斯基共有四種顯著的人格：原創性的藝術家，心理病患，道德學家，以及罪人！⁴佛洛依德繼續指出，在西洋文學史上三大作品：伊底帕斯王、哈姆雷特，以及卡拉馬佐夫兄弟們中都出現了弑父情節，正是面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複雜人格之於其作品的一個重要面向。他認為，藉著犯罪劇情的描繪，杜斯妥也夫斯基對罪人這種身份有著無限的憐憫，罪犯是一位救世主，他殺了人，就沒有人再需要去殺人，因此我們必須去感謝他。透過佛洛依德的分析，我們可以略加掌握杜斯妥也夫斯基這四種身份，以及最為特別的罪人身份在其作品當中將扮演著何其重要的角色。

卡謬 (Albert Camus, 1913-60)，1935年入法國共產黨，於1937年離開。1942發表異鄉人 (*L'etranger; The Stranger*)，次年發表薛希佛斯的神話 (*The Myth of Sisyphus*)。⁵卡謬所存在的時空，乃希特勒與一次世界大戰震撼全世界；以及，由沙特所帶出的存在主義努力保護個人之際。⁶在異鄉人中，卡謬書寫出一種令人感覺精神耗弱，幽閉恐懼式的世界，以精確而華麗的文字印刻出這些微弱、陳腐，以及禁錮的時代氣氛。然而異鄉人與薛希佛斯的神話一書中的精神，以卡謬自己的話語來說，一種荒謬 (Absurd) 的哲學，與沙特的存在主義作品，因精神以及兩者間之友誼關係，與存在

⁴ 見〈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弑父〉，姚嘉為譯，現代文學:47，民國六十一年六月，頁99-111。

⁵ 異鄉人英文書名又譯為 *The Outsider*。以 *The Stranger* 言，強調的是離異之感；以 *The Outsider* 言，則當然著重與他人之間的隔閡，但實際上並無重要的歧異。

⁶ 1943年，Sartre 發表 *Being and Nothingness*。

主義連結在一起。⁷而異鄉人之主角莫梭 (Meursault) 則正是存在主義的英雄。當時的社會氛圍，透過戰爭、屠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不信任，逐漸被分崩離析而不見其重新建構之可能。而國家機器與社會整體在此時為了秩序，所對個人施加的禁錮，造成對個人存在感與存在之意義，甚至與個人的認同與身份 (identity) 之懷疑與不安。莫梭正是在此時此刻成為了存在主義的英雄，他拒絕被收編，他拒絕傳統因襲沿俗的判斷與價值，他拒絕給出解釋。他不能亦不願涉入俗世，因而他只肯認自己的存在。也因此，當死亡之際，他終於明白他的存在與世界同為一體。

Dunwoodie 提醒我們，在閱讀異鄉人時不要先行落入莫梭是一社會不適任者的預設。細心地從文本來看，莫梭時常「努力地工作」、「努力工作一整天」，與至少兩三人存有彼此同意的友誼關係，同時有性行為與戀愛對象。莫梭的離異與疏遠實則建立在他拒絕給出任何解釋的理由，此理由所衍生的行為，以及拒絕說謊、偽善與虛假的禮儀，這正是荒謬之處，也正是莫梭的驕傲之處。

本文將從莫梭的驕傲與罪人的悔罪二處著手，討論此三本書中的核心關於，及其如何賦予政治理論更為遠

⁷ 儘管卡謬本人曾不滿記者將他與存在主義連結一起。見 Peter Dunwoodie 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tranger:xi，卡謬本人更是說：

不，我不是一個存在主義者。沙特與我非常驚訝我們的名字被排在一起。(轉引自前揭書：xi)

而卡謬在日後的瘟疫一書，則正有企圖消彌延宕不去的對他與存在主義之混淆。本文不打算處理卡謬與存在主義間的曖昧關係，僅以此註腳說明。

闊的視野。

二、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創作往往不如他所說的，必須在富裕有餘的情況下進行，反而，《罪與罰》是他債臺高築時預先以小說構想抵押作為周轉時所創作的作品。一八六一年廢除農奴制度後，杜斯妥也夫斯基本持對於未來高度樂觀的態度，但卻無奈如此改革卻無法順利讓他見到一個更為美好的未來。同時，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甚至是「西方的進步」持有高度的懷疑立場，同時對於社會也傾向於悲觀：「不作奴隸，就作統治者」，這樣的哲學之道，在《罪與罰》中使我們獲得一幕。

(曾經的) 大學生拉斯科尼可夫 (Raskolnikov) 乃一精神狀態不甚穩定的知識份子：懷有思想，卻往往無力實踐，居賃在一個「棺材式」的小房間裡頭。靠著與一位放款的老女人不斷典當東西勉強維持著儉樸的生活。他與其萌生之莫名想法—殺了那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共同生活，並為此苦惱。一日在偶然的機緣聽見兩個陌生人談論如果當那個放款的女人死了，那麼這個社會可以用她所遺留的資產照顧弱者：

你覺得如何，一個輕微的罪刑不就成就了幾千件好事嗎？用一條生命就可以使得幾千條生命免於疾病和離散... 從普遍利益的觀點來看—值得！⁸

社會所需要的改革，一旦必須以正義、天理，無論何種名稱指涉的「天啟」做理據時，皆會牽涉到攸關「誰

⁸ 此處看似有效益主義之色彩，則不然：故事中對話的兩個角色無寧在談論的是關於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之財產一旦被用之於社會，則可以免除許多人宥於最低生活限度的苦楚。

聆聽了啟示，誰進行責罰」：

「當然，他不配活在世上，」
軍官說，「可是，這就是自然」

「唉，兄弟，自然必須被更正與領導，否則我們就將被偏見所迷惘；否則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任何大人物了。」

承繼了上文兩人的對話，拉斯科尼可夫認為自己可以改變與導正自然（天理；nature），凡人沒有勇氣進行的正義，可由他進行，一如拿破侖等偉人。於是他殺了放高利貸的，尖酸刻薄，且貪婪的女人，並且在兇殺的過程中，也殺了那個女人的妹妹。事後，拉斯科尼可夫的心境數度經過轉折，但流於外表為人所察覺的精神變化卻引起檢察官波菲里的注意，但是拉斯科尼可夫與波菲里的攻防戰一直由前者所勝出，後者無法將殺人犯繩之以法。當拉斯科尼可夫與妓女索尼雅發生情愫後，索尼雅聖潔的內心不斷感化他，終於他選擇自首，被判決流放西伯利亞，開始閱讀聖經，靈魂終於獲得了重生。

然而，如果我們要一探杜斯妥也夫斯基高度凝斂於作品中的思想，就必須與《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一探。在此書中，杜斯妥也夫斯基以一件環繞在宗族的謀殺案開展了細緻的對話——關於上帝，宗教，哲學的對話。原先預設為上部，但杜斯妥也夫斯基未能完成下部即過世。

老卡拉馬佐夫在故事中扮演著惡德的象徵，大兒子米卡是第一任妻子所生，本質善良卻沈於肉慾，為了女人與財產與父親發生多次爭執。聰穎的二兒子依凡是二任妻子所生，認為沒有上帝，因此美德只是人類虛構之物，一切皆由人類自行定奪。三子阿廖沙為二妻所生，就讀神學院，充滿

了基督博愛的氣息。司米爾加可夫則是卡拉馬佐夫家庭的廚師，是老卡拉馬佐夫在外的私生子，一方面屈服，一方面充滿怨毒。故事就在這幾位指涉著不同觀念，如神聖、世俗，單純的宗族人物互動中開展。

在老卡拉馬佐夫助遭兇殺一案發生後，所有的證據皆指向米卡，但事實上兇手是司米爾加可夫，最後米卡被判有罪，而被兇手借用理論（美德只是人類自行填補內容之空殼）的依凡認為他教唆兇手故無法承受道德譴責而發瘋，真正的兇手司米爾加可夫則自盡身亡。如此悲劇與惡之象徵，在阿廖沙看盡一切——塵世間的一切後，選擇離開修道院，進入人間煉獄中接受折磨。無奈杜斯妥也夫斯基原將此作品設定為系列上半部，未把下半部完成即離開人世。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所接受的基督教思想，以及其基進的社會思想在他一生中衝突不斷，亦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如此對抗。佛洛伊德認為卡拉馬佐夫兄弟們一書正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對自己晚年的懺悔錄。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除了文學價值意義上他所代表的俄羅斯文學風格之外，對社會而言，杜氏點出了社會底層當時苦澀的生活與人間冷暖，但不僅如此，故事主角拉斯科尼可夫所代表的知識份子／對社會不公**憤怒**而企圖進行改革者，對自身能力的絕對自信——**驕傲**（**傲慢；hubris**），據此認為自己可改變自然定律，除去社會不公，而在暴力行使之後，這些改革者的良知歸處與懲罰應如何是？社會的秩序應如何是？這便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這兩本代表性作品中留下的深厚政治理論資產。

如果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拉斯科尼可夫是一積極入世的改革家，阿廖沙投入人世煉獄間亦可視為另一種

型態的「入世」，則卡謬筆下的莫梭毋寧是社會不適的出世者。莫梭於失去親情（母親）時不曾傷悲，面對愛情時，亦持著可有可無之態度：

母親已長眠於地下，明天我要照常上班，我的生活像是灘死水，（既使母親死了）也一點變化都沒有。⁹

實際上，愛不愛根本無所謂，我解釋。

這時她強調結婚是終身大事。

我對這問題說：「不」。

故事的第一部，唐突地以莫梭受太陽的刺激而殺人結束，第二部開始卡謬以死亡為核心縈繞莫梭關於生命總總的思維。莫梭仍舊以異鄉人之眼觀看這一切對他的審判——荒謬的公審，全面的道德公審。而企圖對莫梭施加道德教育的牧師卻引起莫梭的憤怒：

我簡直不知道如何才好，有些東西在我體內流竄著，啾咬著我。我馬上大聲叫了起來，我辱罵他，我警告他不要為我浪費他迂腐的祈禱……他就像行屍走肉，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活著。

莫梭拒絕牧師（意義上的上帝）對他的感化後：

一大股衝來的激憤把我沖洗乾淨，我的希望也逐漸變得空虛。當我仰望滿是星光的銀河，我第一次，把我的心坦然給了仁慈的宇宙，讓我的心體會宇宙，就像我自己

一樣，我發覺過去我真的是快樂的，現在我還是快樂。

莫梭在最後將自己的生命坦然拋給宇宙，將自己生命的美好一股綻放。莫梭依舊驕傲地活著，死去，不若拉斯科尼可夫選擇具有權柄的上帝。兩位作者既使時代背景不同，但皆欲談論個人如何與社會共存？個人該如是面對社會的不義與冷漠？驕傲的莫梭、悔罪的拉斯科尼可夫，以及聖潔的阿廖莎，能夠帶給政治理論什麼樣的啟示？

三、

杜斯妥也夫斯基習於在故事中將自身與自身思想投入作品裡頭，諸如在罪與罰中，於拉斯科尼可夫在酒館相遇而後身亡的退役文官馬爾美拉陀夫，不妨將將其視為杜斯妥也夫斯基那無可救藥的沈淪性格在劇中的一個角色。¹⁰拉斯科尼可夫被放逐的地方，也正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本人被放逐的西伯利亞。

拉斯科尼可夫透過對於超人的渴望思想——像是拿破侖，這類偉大且超越自我與歷史的人——促成了他的行動。超人，尼采的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超人，基於對不同的人性、歷史與環境的想像，前者的超人，尼采一掃形上學的主宰，將生命的浪漫植根於大地與此生中，激發出超人創造性的一瞬；而杜斯妥也夫斯基在面對社會動盪與貴族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雙元壓迫

⁹ 刮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¹⁰ 杜斯妥也夫斯基原先創作罪與罰時，主角設定正是馬爾美拉陀夫，主題是酗酒問題。根據 Freud 之分析，杜氏個人對於賭博的態度十分曖昧難解。簡言之，杜氏賭博之原因不在金錢之利益，而在賭博本身的機率；與此同時，杜氏也深知賭博帶給他與其髮妻之苦楚，此時，杜氏必須不斷賭博犯下過錯請求原諒，繼而繼續傾蕩家產追求賭博，相應於馬爾美拉陀夫對酗酒之態度，本文以為，正是杜氏此種特殊心態的映照。

下，先是創造了一個同樣朝向權力意志前行的拉斯科尼可夫，然而再走回虔誠面對苦難的精神道路；創造一個由被澤神恩之世界裡走入人世的阿廖莎。

卡謬的異鄉人何嘗不是另一種超人，面對的也一樣是對於自身存在所面臨的迫切的危機中，莫梭必須，也不得不的抉擇，成為自我足具意義下的超人，他拒絕接受任何情感上的需索，與世俗利益的功利計算，他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拉斯科尼可夫之所以選擇殺人，諸如經濟的因素：救助自己、母親與妹妹；政治社會的因素：以其錢財幫助社會。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必須執行自己的超人哲學，如伊凡所說，沒有上帝，因此美德無用，超人此時必須不受法律道德任何的桎梏。以實際的感受代替善的思辯，以超人意志的執行代替空泛美德的救贖。此刻，莫梭、拉斯科尼可夫、司米爾加可夫所執行的，都是對自己的存在極端驕傲的肯認下，成為一個超人所必須之行動 (*praxis*)。¹¹然而在罪與罰的後半段，隱喻著聖潔基督精神的索尼亞對拉斯科尼可夫的淨化，將這個行動上成功，卻在思想上不斷自我質疑的超人，以及其背後所象徵的德行／原罪：驕傲引領到通往權杖的道路。¹²而卡謬的異鄉人，足以作為存在主義宣言的代表性作品，其主角

¹¹ 關於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存在主義，甚至沙特之間的關連，可見，Walter Arnold Kaufmann,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又，西方文學研究中往往注重現代主義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就是存在主義與表現主義先驅，甚至多數文學研究者以俄羅斯結構主義傳統分析他在文學上的重要意義，但我將在下文中試著討論宗教意義，最後是政治意義上的杜斯妥也夫斯基。

¹² 此處權杖的概念主要代表是宗教上的思維，佛洛依德認為同時也有對沙皇的效忠，見前引書。

莫梭從故事的一開始就讓讀者接受到強烈的明確與困惑。明確的是，莫梭的許多回應與思考都是常理之下作出最直接的反應，困惑的是，莫梭從來不替自己作出任何解釋。莫梭不依靠他人，不依賴任何精神上的祈求，既使在死前一刻，也只願將自己的生命與宇宙融合。換言之，莫梭的驕傲讓他不接受上帝（牧師），也不願接受社會在意義上的馴服：他只接受自己驕傲的生命力，只願在一瞬間，綻放出自己華麗的生命。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就宗教的意義來說，無論從罪與罰或者卡拉馬佐夫兄弟們中來看，都昭示若上帝不存在，而美德的概念經由啟蒙運動對人高度的自信抽離了具體的內容，且當社會的環境逼使人必須保衛自己時，甚至完成、超越自己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當啟蒙思想在科學上如達爾文的演化論對基督教文明進行了根本性的挑戰，伏爾泰等人又企圖建立一個理性王國取代基督教的王國；在卡謬的時代對個人存在的懷疑與不安，而長久以來，對個人主體之昂揚與肯認往往對政治群體帶來政治秩序遭動搖的惶恐，特別是在對集體崇拜的思維，對國家機器的崇拜在歐洲大陸蔓延時，個體與群體之間如何可能生活？顯然地，卡謬在異鄉人中對宗教不抱持著好感，宗教也好，社會收編也罷，那都不是卡謬所關切的，他真正的關切，是一種人本式 (*humanism*) 的存在。我們或許可以從 William Barrett 的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裡找到一個確切的路標：

他（指 Vladimir Solovyev¹³）
發展了典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

¹³ 1853-1900，詩人、哲學家，發展出俄國思想史中第一套綜合哲學之體系。

基觀點，那便是，理性主義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之間不會有任何和解的機會。¹⁴

簡而言之，如以此種角度看來，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卡繆在他們中作品當中所體現的兩極：驕傲的超人與服膺權杖的罪人，他們必須做出選擇。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生面臨幾次**死亡**：第一次是父親之死，導引出他對父親的敬愛以及其複雜的心理質素。第二次是被判死刑，在獲特赦遭到流放後所接觸的基督教思想，似乎使他的思想開始不再如此相信個人英雄足以自保，他也許接受了基督教，但如前文所提，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臨終前仍然對於自己究竟屬於無神論或者是一個上帝的使民而疑惑。從兩個主要作品來看，**罪與罰的罪人最後選擇進入上帝的國度，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的僅存者選擇離開修道院，帶著聖潔的靈魂回到人間煉獄**。看起來，杜斯妥也夫斯基扮演著捍衛基督教文明作為一種解放的可能。他與尼采都察覺了上帝已經死了，只是尼采為此而歡愉，事實上，尼采為了生命的本身而歡愉，他期待超人，他希望超人出現得以保全這個沒有上帝的時代；卡繆的超人，與在他心中的，那難以在意義上被征服的，卻依然堅持瞭望的故鄉¹⁵，以及他所選擇與堅持的美德：驕傲，一同作為支撐世界的支柱。相反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沒有上帝的世界，如此來看，做出了悲觀的否定，展露決心以上帝的權杖企圖捍衛著基督文明作為一種人文化成與政治空間塑造的可能。

希臘以來，乃至於在基督教義中

被列為原罪之首的驕傲，乃是對於擁有權力意志企圖成為超人者的根本且原初的質素。杜斯妥也夫斯基書寫中的拉斯科尼可夫如是、依凡如是，借用依凡理論的兇手如是：對己能動性之期許，對罪惡感的無懼，及對自己超越現有規範法律的能動性的渴望，這些都在在與基督教文明衝突；而權杖，以佛洛依德所操持的話語來看，乃是一種對父親、權威，一個將可以挽救社會於其將頹然敗壞之勢的可能——一個神聖的，充滿辯證與弔詭，衝撞的依據。¹⁶

由杜斯妥也夫斯基到卡繆，到驕傲與權杖中的擺盪與抉擇，給了政治理論什麼想像？請容我回到文初所引用的 Michael Walzer 對政治理論之核心關懷：

對政治理論而言，重要之議題並非自我（如何被）構成，而是每一個被構成的自我，彼此的關聯及其社會關係型態。¹⁷

如果政治理論的核心關懷如 Walzer 所說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如何關連，以及關連所形成的社會關係，那麼，卡繆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從對人視野遼闊的想像，到以這些想像為基礎出發所描繪的社會樣態，以及在文中裡頭處處可見的，以角色之口代替作者之

¹⁶ 我們必須注意杜斯妥也夫斯基並沒有把重要的下半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完成，持有權杖的僅存者將如何在社會中生活？他會是下一個查拉圖司特拉？一個先知？一個隱匿的遁士？這也許是決定杜斯妥也夫斯基對生命的最終態度。

¹⁷ 見 Michael Walzer，前揭書。值得說明的是，Walzer 這篇文章要談的是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而非本文所關懷之問題。但筆者深感同意 Walzer 對政治理論的核心關懷，見後文說明。

¹⁴ William Barrett,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1962:15.

¹⁵ 有關卡繆、其故鄉與荒謬哲學，請見吳獻人，薛西弗斯的鄉愁，載於聯合文學：民 90.08 頁 64-67

口所提倡的一種理想生活，正是政治理論與文學所同時關懷之處？回到文本裡頭，藉著以基督文明，彼此間的友愛，使驕傲的個人放棄對體制與社會的衝撞，臣服於道德與政治的權杖下，並在社會中宣揚更為友愛與人本的思維，杜斯妥也夫斯基提供了比卡謬更為可能實現的政治秩序之想像，一種深具洞察力的想像。¹⁸卡謬的莫梭足以完全綻放了生命的精彩，但人際之間若不欲見霍布斯所描繪的，令人傷悲，且悲劇性質濃厚的自然狀態中之彼此征戰，則共存之社會將拒絕超人作為社會之一份子。而杜斯妥也夫斯基面對的是社會將敗壞，國家機器必須被迫重新被建構的動盪時刻，卡謬選擇遁入自我以健全保護個人，杜斯妥也夫斯基以拉斯科尼可夫說明如此一來，政治生活，和諧且可盼的生活將不可能—當彼此為了確信自身為超人，將導致社會共識解體—因此他希望以基督文明，在一種辯證意義下的基督文明，先是被拋棄，再被遺忘，最後重回人類心智的基督文明。這樣的對話，皆是以人本關懷為出發，卻走向不同的道路，不同政治之道，替我們展示了對生命的多種思考，與悲樂觀同時交雜的情緒。最後，請容我以一個疑問句作結尾。既使希臘／基督二元宗教體系中對人之傲慢視之罪惡，但一切思維若不以為出發，若阿基里斯—既使他並未功成命全，既

使驕傲的超人不被社會所接受—不曾以生命的氣力給予我們啟示，如果政治理論不以最為根本的人為思考，何需思考，何需感覺生命之意義？

¹⁸ 之所以不用「兩難」是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雖然極化此兩對立共存的概念，但是對他而言，似乎已有答案。

*Jürgen Haacke**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楊 昊 / 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模式在 1980 年代末期之後開始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鑽研，原因除了能從中考掘出東南亞實際合作的個案外，更重要的是希望能由一系列的發展中，找尋推動各國合作的動力與調節合作行為的規範。其中，有不少學術社群開始將研究焦點鎖定在外交與安全方面的「東協模式」(ASEAN way) 上。在 2000 年之後，Jürgen Haacke 發表 *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一書，由歷史淵源的角度重新回顧東協區域的外交與安全文化，同時也揭示了東協模式的起源、發展以及在亞太地區的未來展望。

本書之所以值得推薦，原因在於這是一本針對東協模式進行深入探討的論著，並獲得從事東南亞研究之主要學者的高度肯定。在分析上除了前言與結論外，本書主要有八個章次。前言的部份是本書嘗試將東協的六個區域規範 (norms) 進行概念化的重要起點，Haacke 開宗明義地指出東協有六個重要的區域規範，其中包括了：(1) 主權平等；(2) 不使用武力與和平解決爭端原則；(3) 不干涉內政與不干預原則；(4) 東協不涉入區域國家的雙邊未解決衝突；(5) 寧靜外交 (quiet diplomacy)；以及 (6) 相互尊重與容忍 (p. 1)。事實上，這六大規範正說明了東協內部之「不干涉原則」(Non-Interference Doctrine) 的精要所在，更是東協之外交與安全文化



書名：ASEAN'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著者：Jürgen Haacke

出版者：London

出版地：Routledge Curzon

出版日期：2002

頁數：304 pages

ISBN：0700716521

的核心。為了要仔細審視「不干涉原則」的發展與轉進，Haacke 認為本書從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的邏輯來處理這種特殊的東協外交與安全文化，將是全文分析的一個特色 (p. 11)。

回顧歷史，本書的第一章與第二章旨在解釋東協外交與安全文化的起源 (roots)。第一章大致從殖民時期的東南亞發展史開始回顧，指出這個區域中的外交與安全文化與東南亞國家追求主權獨立運動有關，特別是從社會菁英階層中所散佈的國族論述 (nationalist discourse) 進一步形繪出東南亞各國如何透過東協的外交與安全文化來追求國家的獨立性與主權平等的主張 (pp. 16-31)；接續，第二章 (pp. 32-51) 先探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區域主義 (regionalism) 的失敗經驗 (如 SEATO, 東南亞公約組織) 以及國家間的雙邊衝突與緊張關係，並重新以「由衝突朝向和解 (reconciliation) 與調適 (accommodation)」的發展架構為戰後東南亞國際關係定調。在時間演進的光譜上，Haacke 認為 1960 年代衝突時期 (*konfrontasi*) 的結束，造就了以尊重國家主權、不干涉各國內政為核心價值的東協模式，之所以能成為東南亞國家互動的主要架構的開端 (p. 49)。

第三章從政治菁英與國家領導人的角度來探討自 1970 年代開始東協如何與非東協國家在政治與安全議題上

達成共識。首先，Haacke 回顧了 1970 年代東協國家成立的「和平、自由與中立區模式」(ZOPFAN) 的演進，並探討此舉在冷戰時期所引起的種種區域內部爭議；接續，再探討冷戰後東協區域論壇 (ARF) 的興起及其對東南亞安全展望的影響 (pp. 52-80) 透過「和平、自由與中立區模式」倡議的提出與落實，東協國家將得以由內而外地深化其所堅信之「不干涉原則」。在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最關鍵的動盪即為東普寨衝突，也就是越南入侵東普寨所引起的泛區域安全危機。Haacke 透過第四章詳細描述東普寨衝突的動盪始末，並分析了印尼所提出的「雞尾酒外交」¹ (cocktail diplomacy) 及東協國家對於處理東普寨問題的立場。Haacke 認為在國際壓力下所造成之對東國衝突的政治解決辦法，正象徵著冷戰結構對於東協模式的制約，特別是對於不使用武力與不干涉內政原則的挑戰 (pp. 81-111)，而印尼所提出的「雞尾酒外交」對於新加坡與泰國等東協成員國而言，正意味著對不干涉原則與不使用武力原則的間接挑戰。整體來看，從安全關切、政治考量以及道德層面違反東協區域秩序之概念的同時種種因素影響下，東協國家 (主要是新加坡與泰國) 對於東普寨問題的解決以及其所聯結之不干涉原則的

¹ 「雞尾酒外交」在東南亞實際區域外交實踐上的應用，強調的是一種領導人間針對某重要議題所進行之非正式性並兼具彈性的會面斡旋方式，某種程度上是爲了要達成行爲者間的妥協 (compromise)，可見 pp. 101-107。

詮釋與發展，有了不同的回應與立場轉變 (pp. 101-110)。

在近代，東南亞外交與安全文化深受區域外強權的影響，其中有兩股關鍵勢力不容小覷，其一是來自於近鄰的中國，其二則是來自於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本書的第五章即探討中國在1997年的金融危機後對於東協外交與安全文化的影響。中國在東協區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特殊，一方面在南海主權爭議上挑戰東協長期以來所追求的種種合作精神，一方面卻又在近期崛起之際透過新安全觀的提出呼應東協長期以來倡導的特殊外交與安全文化。不論如何，東協確實很難令中國完全恪守東南亞區域規範 (pp. 112-138)。相較之下，Haacke 在第六章指出大部分的東協國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美國是一個良善強權 (a benign power)，並樂見其所提供之市場、外部安全、區域航道安全之確保、以及美國全球武力投射下的權力平衡。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並沒有與在地國家間的領土爭議，因此也少了些與東協國家直接衝突的可能 (p. 139)。不過，這並不代表東協與美國間並不存在磨擦或爭議，Haacke 指出東協國家仍不滿美國在東協集體對緬甸政策上的干涉，更嘗試調適美國在東協區域論壇中對東協模式所投諸之種種挑戰 (pp. 139-164)。

在探討完東協外交與安全文化的外部挑戰後，Haacke 在第七章回歸到區域內部層次來探討泰國所提出的

「彈性交往」(flexible engagement) 與「強化互動」(enhanced interaction) 對於東協模式的影響 (pp. 165-190)。事實上，區域內部對於東協模式的挑戰起源於1997年由馬來西亞所提出的「建設性干預」(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 政策，接續，泰國外長 Surin Pitsuwan 提出了「彈性交往」的政策，儘管在當時受到東協國家的擱置，但卻留下了各國對於東協國家間建立起「強化互動」的肯定 (p. 167)，而泰國的提議對於東協日後的外交與安全文化之發展，特別是在傳統上被定義為國內事務的議題上，以及東協國家可以介入的影響範圍等，均有相當深遠的影響。第八章則開始討論1998年的河內會議 (the Hanoi Summit) 後的外交與安全文化之發展，Haacke 指出在河內會議後，東協極力強化它的國際形象，並進一步確認其在東亞國際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Haacke 更透過該章的分析彰顯出「東協三頭馬車」(ASEAN troika) 在預防外交 (preventive diplomacy) 以及其他相關區域規範層面的影響 (pp. 191-213)。在全文的結語處，Haacke 評估了東協外交與安全文化的日後發展，探討其究竟在日後會持續演化？維持現狀？抑或告終？Haacke 認為在回答相關問題的判準上仍須環顧內外部區域環境之發展而定，不過，從當前展望的樂觀面來看，東協模式在中、長期的未來仍會傾向持續依所處環境而進行最

適演化 (pp. 214-233)，即在延續某些歷史特質的前提下，東協與東協區域論壇將循「規範理性化」(Norm-Rationalization)途徑演進，並將過去的種種概念與想法付諸實踐(p. 233)。

從歷史的角度端視東協外交與安全文化之發展，不難察覺儘管東協創始成員國的領導人一再主張東協建立的目的旨在強化社會、經濟與文化的交流，但這個區域組織始終與區域政治及安全脫不了干係，從而形塑出具有東南亞特色的外交與安全文化。就此，Haacke 一書的主要貢獻即嘗試從這些區域規範的形塑與演進過程的梳理，來探討更為廣泛的東南亞區域合作的緣起與進一步落實，因此，詳讀本書將能獲得幾個重要的洞見 (insights)：第一，該書所梳理之歷史結構 (戰後迄今) 將能清楚描繪出植基在東南亞重要外交與安全文化中的東協模式，並從中建立起瞭解東協區域國家互動模式以及東協整體制度變遷的「**制度面演進**」層面的解釋；第二，從對東協模式的緣起、發展歷程的討論中，可以清楚瞭解區域內部與區域外部的各種勢力如何影響該制度或規範的變遷，進而揭示了「**權力面競逐**」層面的解釋；第三，本書從「**文化**」層面切入，除了從東南亞殖民歷史與馬來社會文化的影響來鋪陳區域規範的成形與變遷外，更透過許多重大事件內的實際發生情況之說明來解釋東南亞各國與各國領導人究竟基於

何種文化淵源或社會價值，為何 (why) 或如何 (how) 來回應這些嘗試要改變不干涉原則與不使用武力原則的勢力。最後，本書所蒐集之豐富歷史資料與相關分析亦可回饋到理論層面的反思上，這些以文化角度囊括更微觀 (micro-level) 之分析層次的歷史資料，除了可以彌補傳統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強調之靜態宏觀 (macro-level) 體系分析外，亦超越了傳統制度理論 (institutional theory) 所強調之中觀 (meso-level) 制度分析與功能論點，朝向更動態且更真實的過程詮釋發展。儘管 Haacke 並沒有在論述中強調理論建立的企圖，但從分析途徑上可以端倪出上述類似於建構主義的反思邏輯，以及由內而外 (inside-out) 的分析模式。整體而論，本書確實是一部極具深度與廣度的國際關係研究佳作。

Klaus Mehnert

特稿

圍繞毛遺產的鬥爭：

史實造就歷史

吳丕 /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內容提要：德國學者梅納特指出，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德國自然哲學家海克爾的進化思想有關。梅納特的分析有助於我們對晚年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亦有助於我們對長期以來影響中國的進化論進行反思。

關鍵詞：毛澤東思想；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梅納特；進化論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論。反思文化大革命，必須對這一理論進行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德國學者克勞斯·梅納特 (Mehnert, Klaus, 1906-1984) 最早從進化論的角度對毛澤東的這一理論進行過研究，我們應該瞭解他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梅納特是一位研究蘇聯問題和中國問題的專家，他的著作是《圍繞毛遺產的鬥爭——史實造就歷史》(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雖然出版於1977年，但是尚未譯為中文，其研究所得仍值得介紹。

一、起因：毛澤東自稱受到海克爾的影響

1975年10月30日，梅納特作為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的顧問，參加了毛澤東和施密特的會見。在會見中，毛澤東說他要感謝四位德國人，



書名：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著者：Klaus Mehnert
出版者：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出版地：Stuttgart
出版日期：1977
頁數：320 pages
ISBN：3421018251

*吳丕 (博士, 副教授),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北京, 100871。電話：64865476 (家)；手機：13693226223
電子信箱：wu_pi@sina.com, wu-pi@sohu.com。

他們在他本人思想的形成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這四位德國人是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還有海克爾。毛澤東提到海克爾的名字，令在場的德國人非常吃驚。這是因為德國生物學家、達爾文主義者海克爾（Heackel, Ernst, 1834-1919）雖然曾經因為出版了《宇宙之謎》（1899年）一書而著名，但他已經去世90多年，德國人幾乎已經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們沒有想到，中國的毛澤東依然對海克爾充滿敬意，他們當然也不瞭解海克爾對毛澤東有什麼樣的影響。

在這次會見後，梅納特於當年11月30日在德國《世界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毛將此人和卡爾·馬克思相提並論》，¹此人就是海克爾。後來他又於1977年出版了專著《圍繞毛遺產的鬥爭——史實造就歷史》，²對毛澤東與進化論的關係做了進一步的論述。

二、問題的提出：毛澤東為何同馬克思、史達林的觀點不同

梅納特說，他一直有一個疑問：「毛關於革命勝利之後還要革命這樣嚴重背離馬克思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之後，是一個沒有階級因而也沒有衝突的人類的天堂般的未來，而毛卻總是預言在這種時候還有新的革

命」。³

他區別了毛澤東同馬克思的不同之處。「像黑格爾和馬克思一樣，毛也在矛盾的鬥爭中，在正反命題的對立中，簡言之，通過『辯證法』看到了發展的動力。但是，他不像馬克思那樣，把鬥爭只看作是短期的，到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為止，而是恰恰同黑格爾一樣，把它看成是持續不斷的（人們更願意說的是：永遠的）事情。」⁴

他也區別了毛澤東同史達林的不同，「蘇聯只經歷了1917年的一次十月革命（作為內戰延續了幾年）。從此以後，儘管還有流血，儘管還有千百萬人遭受苦難，但再沒有發生革命，沒有群眾自發地捲入運動之中，而是，用史達林的話說，實行『上層革命』……當史達林對列寧的戰友、他的競爭對手進行『清洗』時，他對於蘇聯的社會團體與國家政權在結構上並沒有改變，直到他去世也沒有改變。……自從共產黨在這裏掌握權力以來，不允許出現任何矛盾，以及對矛盾的討論。羞羞答答的改革還可以，革命是不可以的。」

「但是對毛來說，矛盾充滿了『一切過程的始終』，也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不僅是抽象的哲學，而且是非常具體的事實，是通過不同的人群來體現的。不同的人群，在毛那裏馬上就

¹ Klaus Mehnert: "Diesen Mann nennt Mao in einem Atem mit Karl Marx: Als im Gespräch mit Bundeskanzler Schmidt der Name Haekel fiel, hatten die jüngeren Zuhörer Keine Ahnung", *Die Welt*. 30 Nov.1975.

²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³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1

⁴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2

成了對立的階級。他在1962年9月黨的大會上提出「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這裡，他指的絕不是美國或印度的階級鬥爭，而是自己陣營中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不僅是針對在他眼裏向資本主義轉變的蘇聯，而且，事實上也針對中國的不想繼續革命而想在新的秩序中安居樂業的共產黨員，還針對在自身發展中新產生的『資產階級』。」

「毛當然知道，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國的階級結構已經完全不同於以前了，他是在以前的階級結構中取得勝利的，並且，以那之後的數年中消滅了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他堅持他在戰爭年代使用的階級概念，其中首要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會重新出現，當然是在新的偽裝之下。毛不斷發出警告，比如在1962年1月30日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會出現新的資產階級分子』。」⁵

「對於馬克思和蘇共領導人而言，資產階級是由佔有生產資料的人組成的。經過一個過渡階段，通過人民之手（實際上是通過國家及其官僚機構），資產階級在短期的過渡之後就消失了，因為他們的物質基礎已經沒有了。但是毛把資產階級這一概念同他們的物質基礎分開了。他看資產階級的標誌是在思想上，而不是在生產資料和財產上。沒有財產同樣也可以

有資產階級。他教導說：一切最終取決於人們遵循什麼樣的政治路線。在蘇聯，是否認存在著資產階級的，但在實際上，有比中國多得多的資產階級個人，而在中國，卻是經常地同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的。」毛澤東還不斷強調說，階級鬥爭沒有結束，還將長期繼續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以後還要進行多次。⁶

三、毛澤東受海克爾的影響：無窮的鬥爭，無窮的變化

梅納特進一步提出疑問：「事物總是要出現分裂，總是會出現新的矛盾，毛的這種永恆變化的思想，既不是來自於馬克思，也不是來自於中國傳統，那麼，這種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呢？」他稱這種思想為「宏大的世界觀」。⁷

梅納特指出，毛澤東的這種世界永恆變化的思想是從海克爾那裡得來的。海克爾確信，「一切都處於進化之中，確切地說，處於一種『既沒有特定目標也沒有意義（人的理性的意義）』的進化之中。對於海克爾來說，並不存在最終的狀態，只有無窮的鬥爭，無窮的變化——像後來毛說的那樣。」

⁵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2-153

⁶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3-154

⁷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4-155. 毛澤東的引文見：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5頁。

⁸梅納特的意思是海克爾不像馬克思那樣有一個人類進化的目標，他只看到大自然永不停息的變化。顯然，「無窮的鬥爭，無窮的變化」對於毛澤東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

在這種「宏大的世界觀」中，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觀點，而且海克爾與毛澤東都有非常相似的表述。梅納特說毛澤東「在1958年3月有過一個表述，這段話，人們只要聽過一次，就會永世難忘。毛澤東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是不經過變化、發展和消滅的。猴子變人，產生了人，但整個人類最後是要消滅的，它會變成另外一種東西，那時候地球也沒有了。地球總要毀滅的，太陽也要冷卻的』。」⁹

梅納特從海克爾的《宇宙之謎》一書的第十三章找到了毛澤東這一觀點的來源，海克爾說：「宇宙空間是無限廣大和無邊無際的；它沒有一處是虛空，而是處處充滿物質。宇宙時間同樣是無限的；它既無開端亦無終止，而是永恆的。物質處處存在，時時刻刻處於不斷的運動和變化之中……我們人類也不過是物質永恆的進化之中的暫時現象……我們的母親地球也同樣如此……在液化之後，經過千萬年凝固起來，此後它的軌迹一

直在縮小，並向太陽撞去。」¹⁰

毛澤東還有與此相似的言論。他認為共產黨最終是要滅亡的，國家也要滅亡的，到最後人類要滅亡，地球也要滅亡。我們可能想像一下，既然如此，那麼共產黨的最後理想即實現共產主義還有多大意義呢？也許正由於此，毛澤東更重視的是現實，而他認為的現實就是無窮的鬥爭。他有一段名言是：「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在實踐中，他最為看重的其實是與人奮鬥。這應該是他發動文化革命的深層的哲學思想。

四、毛澤東的鬥爭哲學：革命重於生產

梅納特說：「毛畢生都在努力，要給世界帶來新的東西。在他年輕時，吸引他的是樂觀主義的、理性唯物主義的西方啓蒙運動，以及在這一運動中生長起來的一株繁殖力極強的幼苗——蘇聯，這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場革命，在此之後，將是對這場革命的補充和修正。……他從黑格爾那裏接受了辯證法，把矛盾雙方的鬥爭看作是世界歷史的推動力；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學到了把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相結合的學說；從海克爾那，他學到了永遠變化的觀念。」¹¹

⁸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5-156

⁹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4-155. 毛澤東的引文見：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5頁。

¹⁰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7. 中譯本《宇宙之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所譯這一段話與梅納特引用的話差異較大。這裏照梅納特原文直譯。

¹¹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永遠變化的觀念，在毛澤東思想中具體化爲鬥爭哲學。「在毛一生所接受的學說中，沒有比有關矛盾雙方鬥爭的理論更爲重要的了。在他的心目中，這種鬥爭是推動進化、創造歷史的。如果沒有對立雙方的衝突，他就擔心會出問題——停滯，甚至倒退到已被拋棄的社會中去。毛的基本特點就是鬥爭——軍事的、政治的和思想上的。最終目標是：塑造新型的人和新型的社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幾年，他鼓動一場鬥爭，被稱爲『大躍進』；他想直接領導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但是，幾個月後他以慘敗而告終，他的權力也受到重大損失。六十年代中，毛又發起另一場大躍進，稱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想通過文化大革命，使在蘇聯之後產生嚴重官僚主義危險的中國共產黨，從寫字臺後走出來，重新同群眾結合在一起，聽取群眾的意見，即使國家的經濟暫時處於無政府狀態也沒有關係——革命重於生產。」¹²

「毛的目標——在當時是許多書的主題——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他希望出現一種新人（首先是新的中國人），這種人作爲人民的勤務員而存在，在生活上沒有任何特權，沒有其他要求，簡單說來，就是一種人，像

以前出現過的，尤其是某些宗教創始人那樣，作爲理想的人而出現。」

「但是毛同以前的許多先行者不同，他相信，這種新人不是通過美好的說教，而是必須通過實踐而成長起來，通過不斷『革命』，同他們的敵人即那些『老』人鬥爭而成長起來。正如毛設想的那樣，這種人在大躍進中、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曾出現過；他們要打破官僚主義，實行新的工資制度；縮小工農和幹部及技術人員的收入差別，後面兩種人要參加體力勞動（在中國並不是象徵性的勞動）；更重要的是讓『群眾』參與各級領導工作，不僅通過他們的代表，而且要以自發的形式，比如當幹部生活奢侈、不關心工作人員的疾苦時就要通過大字報對幹部予以批評。」¹³

五、進一步的分析與思考

毛澤東在他晚年將海克爾稱爲他的導師之一，足見海克爾對他思想的影響之深之久。那麼海克爾從什麼時候開始進入毛澤東的視線並使毛澤東著迷呢？

梅納特推測毛澤東早在1918—1919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管理員時，就有可能讀過海克爾的《宇宙之謎》。其實毛澤東讀到此書的時間應該比這還早。海克爾的這本書最早是由馬君武翻譯過來的，當時譯爲赫克爾《一元哲學》，連載於《新青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298-299

¹²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20-22

¹³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216, 217

年》雜誌第2卷第2—5號（1916年10月1日—1917年1月1日），而《新青年》正是毛澤東當時最愛讀的雜誌之一。1920年8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單行本《赫克爾一元哲學》，當年毛澤東組織的新文化書社的售書目錄中就有這本書。可以想見，毛澤東二十多歲閱讀此書，到年過八十仍對其作者推崇有加，這本書對他的影響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梅納特還發現：海克爾這本書的中譯本，「在共產黨統治下，第一個版本是1958年出版的，也是在這一年，毛將海克爾的一個主要思想用令人震驚的語言在一次講話中表述出來。第二個版本是在1974年出版的，是在毛同聯邦總理談話之前不久。」¹⁴他所說的1958年的版本是馬君武翻譯本的重版。1974年的版本則是幾位學者奉命重新翻譯的，據說當時政治局委員人手一冊。這當然只能是奉毛澤東之命，也只有毛澤東能夠讓政治局委員們都去讀這本書。¹⁵

梅納特說，在1974年，中國全國的書店都是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批林批孔」、「批水滸」的小冊子的一統天下，一夜之間，海克爾這位「洋古人」的書進駐紅光閃耀的新華書店，確實是令人吃驚的事情。海克爾在德國早已被人淡忘，但是他的書卻受到萬里之外的中共領袖

毛澤東的偏愛，在那樣的年代能夠堂而皇之地出版發行，而且印數為40萬冊，難怪梅納特感到驚訝：「人們很難想像，在中國，除了毛以外，還有誰能夠讓《宇宙之謎》在1974年出版中文本，而且其印數大大超過了它的德文本。」¹⁶

梅納特研究毛澤東與海克爾的關係是在1977年。那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對於文化革命的反思還沒有開始，在思想上佔據主流的仍是「兩個凡是」。在這種條件下，梅納特作為一個對中國友好的外國人，不可能對文化大革命有多麼深刻的反思。從他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自己對於文化革命還多少有些欣賞和讚揚。我們應該認清這一點，並且把它放在一邊，主要看梅納特從哲學上的分析，這是他的貢獻。

當然在接受梅納特的這一貢獻之前，我們也可以把我們通過1978年以後的長期反思的結果作為前提。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它的錯誤之一就是不斷挑動人與人的鬥爭，即所謂階級鬥爭。將這種鬥爭稱為革命，並且認定革命重於生產，其後果就是經濟的大破壞，政治的大動盪，社會的大倒退。

以這種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為前提，通過梅納特的研究，探索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理論的

¹⁴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8

¹⁵ 參見袁志英：《引起“一場大風波”的書》，《中華讀書報》2002年10月30日第14版。

¹⁶ Mehnert, Klaus. *Kampf um Maos Erbe: Geschichten ma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1977. p158

哲學基礎，這就是梅納特的著述的作用所在。

毛澤東受海克爾的影響，對社會發展的看法，是認為一切都在不停的變動中，社會要在急劇的變動中向前發展。這種發展就是進步。人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促進這種發展。1957年，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奚若批評共產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毛澤東卻非常喜歡這種說法，他認為革命派就要好大喜功，就要急功近利，人類歷史就是一代強似一代，這才叫進化，才叫進步。¹⁷為此，他還主張要不斷提出新口號，來強化極左。毛澤東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對穩當派有個辦法，到一定時候就提出新的口號，不斷提出新口號，使他無法穩。」¹⁸實踐已經證明，這些都是偏激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毛澤東的錯誤從哲學上看，是建立在錯誤的進化觀之上的。

因此，在反思毛澤東晚年錯誤時，要研究進化論對他的影響。要認識到，把人類進化看作是在矛盾衝突中永遠變化的看法是錯誤的，或至少是不全面的。在和平建設時期需要團結、和諧、統一。在發展觀上，要承認穩定、漸進、改革。鄧小平理論在

這些方面糾正了毛澤東的錯誤，也使中國走上了正確的進化之途。相信梅納特的分析，對我們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鄧小平理論的正確，是會有幫助的。

¹⁷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8日，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第78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¹⁸ 王任重日記，1958年4月12日，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第80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